

21/101

宗慶縣文史資料選輯

89 第七輯

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
崇慶縣委員會
編

目 录

民国时期崇庆县佛教概况·····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委会	(1)
中国青年党在崇庆县·····	邓杨蒲王 (8)
“便衣队”在怀远镇的片断回忆·····	杨启迈 (26)
驻马店受降记·····	魏煜焜 (33)
红军第一架飞机驾驶员——龙文光·····	杨明春 (46)
崇庆县射德会·····	叶荫根 (51)
略说县城近十年出土文物·····	施权新 (54)
崇庆中学的两首校歌及其学风·····	杨永廉 (58)
我的舞香生涯·····	谭金良口述 毛甫澄记录整理 (64)
王大袖子逸事·····	张伯龄 (74)
回忆我的父亲——唐湘帆·····	唐燧良 (78)
竹哑巴二三事·····	雷志华 (86)
泛谈崇庆县的典当业·····	向新才、阙志鹏、龙知新 (94)
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崇庆田赋·····	杨春其 (101)
元通场的“鱼蹦滩”·····	李玉麒 (127)

民国时期崇庆县佛教概况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委会

崇庆县有关佛教的记载，可上溯到隋唐时期。

民国时候全县有佛教寺庙三百二十八座，僧尼六百余人。仅和平一个乡就有大小寺庙三十八座，上下古寺就有和尚一百多人。晨钟暮鼓，里巷相闻；香烟缭绕，终年不断。

崇庆县的佛教属于大乘佛教，且大半是以《弥陀经》为宗旨的净土宗和以《观音经》为宗旨的禅宗。

佛教寺庙分为丛林和小庙两大类。丛林又分为十方丛林和子孙丛林。崇庆县只有唐代建造的常乐寺（今下古寺）为子孙丛林，其他都是子孙小庙。丛林一般设方丈，下有四大板手，八大执事，及若干工作人员；中等寺庙设都监、监院、护寺三职；小庙则只设住持。

寺庙内一般有天王、大雄、观音三个殿和一个藏经楼。寺内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各有专司，不相杂厕。

宗教活动各地小有不同。崇庆县古寺与新都宝光寺的情况基本一样。每天早晚都要上殿（法事内容为：跪、拜、念、歌，而又以后三者为主。）；双日早上念《楞严经》，晚上念《八十八佛》，单日晚上则念《弥陀经》，吃早饭时念《供养咒》（宝光寺是早饭后上小殿）；宗教节日则行三十五参，在做法事时，驻寺僧人不论是本庙或外庙来的都必须全

体参加。这些规矩在中等寺庙就放得比较宽些，小庙就更见随便了。

各乡较大的佛教寺庙，每年多有定期活动——庙会。如羊马乡老广寺有童子会，牛皮乡三台山有三婆会，道明乡二月初十有东岳会，隆兴乡二月十五有炳灵会……所有这些大小庙会虽都曾载誉当年，名重一时，然若与白塔院的“朝山会”相较，那就难免有瞠乎其后之讥了。

白塔院位于道明乡境西的白塔山上。旁有隋代建造的五级浮图一座，为崇庆县八景之一，故院因以名。

全院由五个四合院组成，计有大小殿堂庙房七十八间。院内神灵，一应俱全。四大金刚，文殊普贤，莲台释迦，南海观音等佛教系统诸神自不待言。三婆娘娘、莹华菩萨也各雄踞一殿。另还有福祿财神、痘麻娘娘等并非佛教系统的神灵也同享香火，这显然是院内和尚为了增加收入，招徕施主而特意塑造的。

每年农历的六月初一为白塔院“朝山会”的开山日期。从这一天起，远近善男信女前去拜佛祈神、烧香还愿者川流不息，络绎于途。在这些人中间，多数是小脚或半小脚的老太婆，他们头顶烈日，背背香篋，佝偻彳亍，汗流满面。从山脚到山顶，一线石阶，一线人流隐现于万苍千翠之间。从平坝仰望过去，长龙蠕动，历历在目，真好似一幅够人陶醉的天然图画。

到了山顶，有的立即对白塔躬身下拜（因塔的底层供有摩光菩萨塑像）。或双手合十，表示自己的虔诚。及至到了佛祖或大士像前，更是必恭必敬，诚惶诚恐，三跪九叩，顶礼膜拜，大有“祭神如神在”之感。他们有的求签，有的打

卦，或问自身体咎，或问儿女前程。至于献香献帛，捐油捐钱，祈求神佑，更是踊跃输将，唯力是视。总之宁可饿着肚子回家，也不愿对菩萨表现不诚。

在这一个月的“山会”期内，不仅院内和尚大发横财，就是那些零摊小卖，乃至附近农家也都各有可观收入。善男信女，游山香客更是心满意足，尽兴而返。

佛教寺庙一般叫寺、院、庵。寺、院一般住男僧（和尚），庵住女僧（尼姑）。

佛教徒住在庙内叫做“出家”或皈依“佛门”。出家后，要在一定的宗教仪式下接受戒律，叫做“受戒”（俗呼烧九斗窝）。受戒以后，才算正式的佛教徒。男曰和尚，女曰尼姑（也叫僧和尼僧）。从此终身不婚嫁、不蓄发、不茹荤腥、不杀生赌博……；衣着也和和在俗的人不同，要着无领大排子的僧服，戴元形空顶的僧帽，穿微黄有鼻梁的僧鞋，在礼佛、拜忏、做法场一类的法事时，还得批上法衣（袈裟）。他们每天的常课可以概括为这样两句话：“黄卷青灯本鱼伴，打坐参禅悟妙玄”。

僧、尼的生活来源，一是靠庙产为生，大庙有的有水田数百亩，中等几十亩，少者几亩，少有无产业者。如上下古寺，每年收租，黄谷即有五、六百担，玉米六、七百担，供养水寺僧众，绰绰有余。二是民间有请超度亡灵者，和尚可以出庙去做法事。如放“焰口”做“道场”等。收入所得，按庙四、僧六分成。三是依靠各庙佛事活动，善男信女自动捐助功德钱财。四是外出化缘。总之，生财之道，各有门路，生活来源，全靠众生，饮食虽属清淡，但温饱有余。

民国时期信奉佛教的人很多，确切的人数却很难统计。因为这些人有的在家里设立佛堂，念诵经文；有的既拜佛，又敬神敬祖；不少地方还佛道不分；更有许多人只是有求于佛时才进庙烧香念经，平时却并不虔诚；即在庙的六百多僧尼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出于信仰，而是为了谋求生活出路才去出家为僧的。

由于全县寺庙多，僧尼多。清光绪年间成立佛教会加以管理，当时还有僧官职称，辛亥革命后，始改名会长，分一正二副。下设总务、文书、理财、收支、交际、调查员、审查员等职。人选由各寺庙方丈、住持推荐选举。会址最初在北门外辰居路早觉庙（俗呼皂角庙，即今县兽防站），继移至城内正东街城隍庙，最后又迁进同街土主庙普净佛学社内。经费主要来源于上下古寺，其次即为居士们的布施和捐献。自成立到解散，先后改选过九次（见附表）。临近解放时为理监事会制，设理事长一人、常务理事二人、顾问三人、理、监事若干人，成员比较复杂。因为这时地方政治势力已渗透进佛教界，佛教徒中也有不少人钻入了政界或地方势力的圈子内，彼此勾结，相互利用。以故在1947年新改组成立的中国佛教会崇庆县支会的十二名理监事中就有五人是川军团长、县参议长、青年党或国民党骨干分子；七名佛教徒中有三人是县参议员或名誉参议员，有的竟是袍哥“大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被镇压的有两人，被关押的三人，受管制的二人。佛教会从此土崩瓦解了。

崇庆县佛教会从诞生至消亡的数十年间，除了研究佛学，管理全县寺庙，和每月初一、十五或佛祖、观音诞辰节日组织会员转佛诵经外，尚做了如下两件事。

(1) 创办明心小学

民国时期，四川军阀执政，地方团阀、学阀、绅棍借口办团办学，无不视庙产为肥甘。全县庙产，古寺最多（有水田近五百亩，林山若干段），引起这般人的觊觎垂涎。1929年春天，中心乡团练局长李新廷以办学为由，估提寺产。为了抵制李的这一妄行，上下古寺方丈祖道、祖权根据《四川省佛教会关于保护各县佛教会自动兴学的通告》的指示，用佛教会名义，创办明心小学于北门外辰居路佛教会内。成立校董会，办理立案手续，选出校长，延聘教师……；经费全部由两寺负担；招收各寺小沙弥和附近的学龄儿童；学制分高、初两级；课程全按教育部规定设置。

由于校董会负责，校长得人，更兼师生努力合作，以故在第一班学生毕业时即收到累累硕果。除在俗儿童大半都已考取县中高一级的学校不计外，小沙弥升入四川佛学院肄业的也有将近十人。古寺的灯旭、灯妙、灯宽，水陆寺的圆净、圆智（后任成都文殊院方丈，名佛如），牂柯寺的心乐、心恺……表现尤为突出。

从1929年创立迄1948年结束，这所学校前后共办整十九年，其间校董会曾经两度改选（1931，1946年），校长则四易其人。

总的说来，这所学校在当时是做出了成绩的，对崇庆县的地方教育事业也有一定贡献。

(2) 邀请高僧来县讲经

四十年代前后，不少著名佛教人士曾被邀请来崇庆县讲过经，先后计有：西藏的章嘉活佛、青海的喜饶嘉措、五台山的喜通法师、西藏喇嘛悦西格希和青海的贡嘎和尚。此外，昌圆和能海两法师也曾先后来崇。其中能海来过两次（1939，1945年），两次都受到当时县长的亲自接待。第一次在县党部，各机关法团人士参加听讲；第二次在文庙大成殿，一般善男信女都可前去参听。真是人山人海，盛极一时。

佛教会的九次改选时间：

时 间	主要负责人	备 考
民国二年 (1913年)	宗兴(上古寺)	成 立
民国四年 (1915年)	法松(西山寺)	
民国六年 (1917年)	通 德	
民国八年 (1919年)	广 正	
民国十年一十二年 (1921—23)	停 办	原因不明
民国十三年 (1924年)	源镜(土主庙)	四川省佛 教会指派
民国十六年 (1927年)	祖林(长寿寺)	
民国二十年 (1931年)	广种(西山寺)	
民国二十七年 (1938年)	广 文	
民国二十九年 (1940年)	水陆寺僧佛如，牂柯 寺僧心悦联名发出改 选佛教会通知，未遂。	
民国三十六年 (1947年)	印三(下古寺)	改组为理 监事会

中国青年党在崇庆县

邓杨蒲王

一、青年党崇庆县党部的渊源和发展

(一)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曾琦、李璜、何鲁之等人在法国巴黎组织成立中国青年党，出版《先声周报》，宣扬国家主义，对抗共产主义，在留学生中进行反共活动，受到中共周恩来、王若飞等的揭露和批判。一九二四年，青年党总部移到国内，并在各地成立各种名目的外围团体。一九二五年又正式成立国家主义青年团。青年党总部在上海出版《醒狮周报》，盗用“五·四”运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鼓吹“全民革命”，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打倒帝国主义，致力于反共、反苏、反孙中山、反对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反对进行北伐战争。他们秘密发展组织，策划“组织力量，布置武装，找根据地，建立政权”。该党积极投靠北洋军阀，派张润苍、刘泗英钻到吴佩孚左右任秘书、任政务处长；派陈启天、余家菊等到孙传芳的金陵军官学校和张作霖的东北讲武堂讲授国家主义，从中培校青年党的军事干部。曾琦估计：“特吴败，北洋军阀必有起而代之者，苟非张作霖必属孙传芳。”一九二六年七

月，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曾琦为委员长，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张子柱等七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一九二六年，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八月、十一月吴、孙主力相继被歼，北洋军阀败溃。青年党为找靠山，求发展，一面继续与各地军阀，特别是川、滇军阀杨森、刘湘、唐继尧等勾结，为“反共防共”出谋划策，并乘机渗入军内和政界，发展党务，扩充实力；一面通过国民党内西山会议派谢持、亲日派杨永泰、CC系陈布雷、政学系黄郛等多方门路靠拢蒋介石、汪精卫，煽动蒋、汪背叛革命，为蒋、汪“铲除共党”告密、献策，向蒋、汪领取秘密津贴，并企求同国民党“平等联合”执掌政权。但蒋介石国民党对青年党却有戒心，视为异己，加以压制，更不愿给予平等地位。

早在一九二五年，青年党就开始在四川进行建党活动，总部最先派张懋霖(字雨村)回川与重庆女二师校长杨叔明、教员彭芸生(杨、彭均为崇庆县人)建立关系，开展党务工作。一九二六年，总部又派张北伦和罗治安到重庆女二师和重庆联中任教务主任。当时联中校长徐思平已由杨叔明拉入青年党，他们以两校为基地在师生中大肆活动，组织国家主义团体“起午社”。张懋霖还在成都通过其侄张昌达组织“惕社”。当时中共党人肖楚女在重庆女二师任教，对青年党的反动理论和张北伦、杨叔明等人的活动，在《新蜀报》上撰文进行揭露。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张北伦、罗治安等人硬说《新蜀报》批评女二师不参加“五卅惨案”周年纪念示威游行，是“有意侮辱学生”，煽动、怂恿两校部分学生捣毁《新蜀报》，引起了新闻界的公愤。一九二六年下年，李璜和陈启

天、刘天予等人从上海来川，在成都大学及成都联中任教，并亲自指导和协助杨叔明、张懋霖等人在四川开展党务工作，他们以成大和联中为基地，大肆发展“惕社”，进而使“惕社”发展到成都高师、华大、省一师等校。骗取了不少青年加入青年党，培植了魏自新、刘东岩、费明扬、青成烈等一批重要党务骨干。杨叔明、彭芸生是青年党四川党务的开创人，出力颇大。李璜在回忆录中称他们为“四川惕社的老一辈领导人”。一九二七年前后，北平各大学毕业的青年党四川籍学生陈翰珍、陈谅叔、姜蕴刚、宋益清、龚从民、陈介卿、施士初（后四人均崇庆县人）等又先后回川，从事党务活动。李璜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四川发生“三·三一”惨案时机，以青年党川康特派员身份亲自在四川一面“办党”，一面活动于军阀之间，并策动刘湘支持杨森配合何建夹攻“赤都武昌”。还借助刘存厚（北洋政府委任之“川陕边防督办”，此时割据绥定、宣汉、万源、城口四县，吴佩孚率残部受其庇护。）之保送，派党人邹善岩、龚从民、祝顺昌、林华钧等赴日本士官校受训。这一时期，“四川党务发展至速”，受到曾琦的赞扬。一九二七年七月，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继续串通四川军阀拥吴佩孚东山再起。一九二八年青年党四川省支部正式成立，杨叔明任主席。一九二八年冬，青年党派杨叔明到绥定河坝市见吴佩孚，表示愿助吴“复兴旧业”，吴任杨为其“行辕”的“高等参赞”。杨任青年党四川省支部主席后，拉拢了一批四川军人李家钰、黄石子、朱瑛等加入青年党。

一九二六年，崇庆县立初级中学校长、青年党特派员张子为以学校为基地，开始在崇庆县进行党务活动，宣传国家

主义，组织外围团体“艮社”，积极吸收青年学生入社，培养入团、入党对象。“艮社”由贺佛如、张桐溪、张挽澜等人负责。一九二八年，王映东、张桐溪、张挽澜、陈济宽、徐思执、高介孚等到成都在省支部正式加入青年党后，回县正式成立青年党崇庆县直属小组，王映东任组长，由省支部直接领导。他们还联络教育界青年，组织外围组织“健社”（后误读误写为“坚社”），王映东任主席，张桐溪任文书、肖重伦、高介孚任训练，王少岩、戴云裳任宣传，张挽澜任奖惩。一九二八年，“健社”举办预备团员训练班，省支部特派刘东岩、青成烈、乐韶成等来县进行训练，讲授国家主义、青年党党史等课程。不久，张挽澜任崇庆县立小学校长，又以该校作为党务活动据点。一九二九年，张子为到二十九军第三路司令王思忠部当秘书长离开崇庆，县中校由余治安后又由韩德滋接任。余韩均倾向青年党，青年党人施士初、宋益清等继续把县中校作为党务活动基地。这一时期，青年党的活动还处于秘密状态，入社、入团、入党“重质不重量”，条件限制较严。到一九三〇年，“健社”社员只有一百余人，入团、入党者尚不及半数。此外徐思执、宋万松等还组织有“知行学会”，“学行砥励社”等外围团体。一九三〇年，“学行砥励社”举办预备团员训练班，省支部特派龚从民、杨益志来县进行训练，讲授国家主义和青年党党史等课程。经过这一时期的活动，青年党在崇庆县的组织发展，打下了基础，培养出一批骨干。但是，青年党在崇庆县的发展和在全国的境遇一样，亦非一帆风顺。一九三〇年，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周克谋出任教育局长后，便借故撤换张挽澜县立小学校长职务。在青年党的支持下，张拒不移交，被

县政府拘押，青年党便借题发挥，发动“驱周运动”，闹出一场大风波。结果，周被迫离县，张亦不得不办理移交。青年党在教育界的阵地遭到削弱，党务工作受到挫折。

（二）

一九三三年，青年党为配合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特派李璜来川协助刘湘“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李策动军阀，士绅组织“四川省安抚委员会”，李自任前敌安抚主任，往返活动于刘湘总司令部和下辖五路总指挥部之间，为各“剿共”军阀出策、打气，亲自制定《剿共须知》，到处鼓吹，广为印发。李璜借此“良机”在四川大力推进党务。青年党总部因此决定，要把四川“建成为”该党“根本之根本”。

一九三三年下年，崇庆成为二十八军防区，青年党人朱瑛以军部参谋长身份出任崇庆县长。驻军旅长黄石子也是青年党人。时逢青年党人施德全因地方势力关系在崇庆县当团务局长。在朱、黄、施等人的支持和推动下，青年党崇庆县区党部正式成立，直属省支部领导。区党部委员由汪洁、程斯超、乐韶成三人担任。同时成立了崇庆县国家主义青年团团部，由陈济宽负责。这一时期，驻军副旅长李蘊山也是青年党人，县公安局长白绍昆、建设局长雷次山、县中校长陈介卿、县立小学校长王映东都是青年党人。徐思执、施直先、徐真如等青年党人还抓到了天官堂小学、羊马小学、王场小学校长职务。一九三四年，崇庆县成立“清共委员会”。当时驻军已由李树骅旅换防。李树骅任该会执委会主席，朱瑛任该会监委会主席。国民党县党部成员黄润皋、李松琴、

周志仁、孙宗权、卢友贤和青年党的施德全等为执委会委员。青年党的王映东、陈介卿、白绍昆和国民党的罗国彩等为监委会委员。施德全兼缉捕科长，卢友贤兼调查科长，李松琴兼总务科长。青年党和国民党在崇庆县第一次公开合作，充当“清共”的急先锋。这一时期，青年党在崇庆县的实力急剧膨胀，当时号称“全县二镇六乡过半数是青年党的天下”。这便是所谓青年党在崇庆县的“极盛时期”。

（三）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入川，坚持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治。虽然李璜、左舜生一九三四年先后晋见蒋介石，力陈反共“功绩”，力表反共决心，但蒋介石对该党企求与国民党“公开平等联合”，不能容许，对青年党在四川的活动怀疑、不满，对之进行监视和限制。青年党首领乃被迫相继离川，青年党中央不得不发出停止吸收新党员的命令。青年党在崇庆县也形势逆转，随着朱瑛和后来的李暄荣两任青年党人县长先后调走，施德全、白绍昆等也陆续下台。陈介卿的县中校长职务也被国民党复兴社分子罗国彩所取代，青年党从此失去了县中校的重要发展基地。当时县上国民党复兴社组织不仅竭力反共，镇压群众一切进步活动，而且把青年党的活动也列为调查监视的目标。青年党崇庆县区党部的活动受到了限制，党务工作陷于停滞状态。不少青年党党员陆续加入国民党、三青团另找出路去了。一些主要领导人陈济宽、陈介卿、徐思执、王映东等不得不先后离县去外地。这便是青年党在崇庆县的所谓“中衰时期”。尽管如此，蒋介石国民党对青年党还是手下留情，

并未加以禁绝。青年党崇庆县区党部组织仍然存在，始终有负责人支撑党务工作。他们是王映东、安宅人、李伯吹、段前川、戴孟材、王季文、施德全等人。

（四）

“西安事变”前夕，青年党根据潜伏在西北军中的党徒获悉的情报，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有发生“肘腋之变”的可能。曾琦特派李璜以祝寿为名亲去洛阳晋见蒋介石，呈送情报，劝蒋勿去西安。但当时，蒋介石未予重视，还对李夸口说：“不过半月，便可收剿匪之全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蒋专门电邀曾琦、李璜、左舜生到奉化溪口长谈。李璜事后写道：蒋介石“有感于慕韩（曾琦别号）托我赴洛阳劝告之事”，“陈布雷更觉我们有先见之明”。“七·七事变”前夕，曾琦乃被蒋介石、汪精卫邀请参加“国难会议”。以后，曾琦、李璜、陈启天、左舜生、余家菊、常乃德等人又被蒋、汪邀聘为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委员。汪精卫公开投敌后，青年党采取“两边踩”的办法，求发展。一方面，青年党的赵毓松、周济宽、李守黑等公开附逆，组织“青年党中央政治行动委员会”，曾琦则留住上海郊区，王师曾前去北平，与日伪继续暗中勾搭。崇庆县人，青年党中央委员徐思执曾暗去南京参与同日伪的挂钩活动。另一方面，李璜、左舜生等则高唱“政党休战”、“共赴国难”、“一致对外”、“救亡图存”，活动于重庆，致力于进一步靠拢国民党，配合蒋介石积极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青年党四川省支部配合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行动，深受蒋党特务机关的重视。一九

四〇年二月，国民党《中统局情报》称：“中国青年党四川省为该党历来根基最厚之地，现鉴于共党在省内积极活动，恐碍其发展，乃筹划防共，积极加强组织，整理该党党务之外，并决定防范共产党活动之办法如下：……（共五条），已由该党省支部通令各级遵行之”。一九三九年，李璜任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成都办事处主任，该处人员全是青年党人。李借机亲自带领省支部主席陈翰珍到成都附近各县视察党务，帮助调整机构，并召集成都附近各县党务干部到省参加讲习受训。这便是青年党在四川的所谓“复兴”的开始。崇庆县青年党人王映东、陈介卿、陈济宽等此时亦纷纷返县协同段前川等留县党人从事“复兴”党务工作。他们全力支持戴孟材出任民教馆长，把该馆作为暂时聚会活动据点。是年崇庆县区党部负责人段前川曾专去成都陪李璜、常燕生、周谦冲来县召集青年党人六十七人集会，并发表演讲，历时两天。是年，青年党人重振旗鼓开办了敬业中学崇庆分校（后改名为弘毅中学）。先后由黄润琴、施德全任董事长；安宅人、王映东、陈介卿、高朝贵任校长。青年党人丢失崇中阵地不到四年，又在县上重建了重要活动基地。一九四六年青年党部正式成立后，特别设立了弘毅中学直区党部组织。

（五）

抗战胜利时，蒋介石以所获取的曾琦在南京与汪逆精卫会晤时的照片为把柄，彻底制服了青年党；以委任高官为条件，完全拉拢了青年党。青年党宣称自己“已成为和平普通政党”，表示甘当国民党的尾巴。它的第一件献礼，便是上